

Sunday and the... Armed U...
Revolution in Iran
Man Revol...



二十世纪 大将军

张天瑜 宋元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基础，对现代科学技术
大意义。为此，诺贝尔物理学
尔物理学

20世纪
维尔·
德国人
们也
立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世纪初其他科学家基础上，发表
构造和分子物理学

二十世纪 大将军

张天瑜 宋元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大将军/张天瑜 宋元明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1

(世纪回眸丛书)

ISBN 7-200-03193-3

I. 二… II. ①张… ②宋… III. 军事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K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622 号

二十世纪大将军

张天瑜 宋元明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141 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3193-3

K · 326 定价: 9.00 元

内 容 提 要

20 世纪风云变幻，战争频频——战争创造了将军。本书以简练的语言描述了在本世纪世界性大战中出类拔萃的十几位著名将领。书中既对彭德怀、刘伯承、张自忠、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正义之师的将领作了重彩描绘，也记叙了隆美尔、山本五十六等法西斯将领。通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主要经历、指挥的重大战役以及这些战役的历史意义，勾勒出 20 世纪一幅幅生动的战争画面。

60492/08

“世纪回眸”丛书编委会

策 划：赵永清 孟 捷

主 编：赵永清 孔寒冰

副主编：王福春 赵育正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向勤 艾四林 许 刚 吴学永

吴晓东 钱国平 崔伟奇 彭华璋

二十世纪大将军

主 编：张天瑜 宋元明

编写者：吴 真 李忠斌 俞 磊 侯晓炎

姚 震 郭若愚 彭 浩 蔡书墨

总 序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

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前进与倒退,建设与破坏……没有哪一个世纪像 20 世纪这样令人类激昂奋发,又使人类沉思惊醒。

回顾 20 世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大发明,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大伟人,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大明星……无一不令我们振奋、骄傲和自豪。20 世纪的人类以自身的伟力改造、改变了世界的面目,迎来新世纪的黎明。

但是,20 世纪并不全是辉煌灿烂,20 世纪也充斥血雨腥风:大战、热战、冷战;谋杀、灾难、政变……多少人死于无辜,多少人流离失所。人类在 20 世纪遭遇的不幸,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20 世纪扑朔迷离。20 世纪值得回顾。

知往为开来,回顾为前瞻。本丛书不仅为世纪的同龄人,为战后的中年人,更为跨世纪的青少年。愿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本丛书以专题的方式,精选 20 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和世纪性影响的大场面、大事件、大发明、大人物、大将军、大文豪、大明星……予以精彩描述和精当分析,使人们在历史知识的熏陶中,更好地把握现实和认清中国在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世界格局中的历史作用,走向新世纪。

20 世纪正在逝去,21 世纪即将来临……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举目九天觅帅星	
——记刘伯承	(1)
浩气长存 傲骨永在	
——记彭德怀	(16)
抗战史上第一人	
——记张自忠	(29)
传奇式元帅	
——记朱可夫	(41)
斡旋将军	
——记马歇尔	(53)
欧洲战场登陆名将	
——记艾森豪威尔	(75)
西点名将	
——记麦克阿瑟	(90)
装甲铁流之魂	
——记巴顿	(102)
毁誉不一的元帅	
——记蒙哥马利	(118)
嗜赌将军	
——记山本五十六	(132)

“沙漠之狐”

——记隆美尔 (147)

“沙漠盾牌”的赢家

——记施瓦茨科普夫 (159)

举目九天觅帅星

——记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历史时期。

“半生军阀半生革命”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一户农民家里。虽然家境贫寒，他父母还是怀着“出人头地”、“望子成龙”的愿望送他读了几年私塾。他学习非常认真、出色。

1903年，刘伯承和他的父亲同去参加科举考试，并在预考中双双中榜，但却因为是“优人之后”而被逐出正式考试的考场。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刘伯承纯洁的童心，使他认识到了旧社会的黑暗、丑恶和不公，从而促使他逐步与旧社会决裂，踏上创造新社会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胜利的消息使刘伯承第一次强烈地感到：武力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只有武力才能以雷霆万钧之力对抗旧势力，摧毁皇权统治。于是，1912年春，他考入重庆将校学堂，开始了漫长而曲折、伟大而悲壮的军旅生涯。

从重庆将校学堂毕业后，刘伯承被派到四川老同盟会员熊克

武组织的蜀军第五师，后来他又组建了川东护国军。1916年，刘伯承在一次组织部队的撤退中，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的身体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威胁，便猛扑过去，大吼：“危险，快趴下！”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子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血流如注。他昏倒在地。经过一番周折，他住进重庆“宽仁医院”，由医术高明且对眼外科尤为擅长的德国军医沃克医生为他治眼伤。在安装假眼的手术中，为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安然端坐三个多小时而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沃克医生见他扶着椅柄衣服浸透了汗水，颇受感动地说：“中国古话讲：‘目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想必疼痛难忍吧？”刘伯承坦然笑道：“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沃医生惊诧地问：“你怎么知道的？”“阁下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沃医生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失去右眼这一年，刘伯承才24岁。

此后，他以仅存的左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部队转战巴山蜀水，在讨袁、护国、护法和讨贼战争中立下屡屡战功，“独目将军”的声威传播军界。

刘伯承在川军任职的十多年中，戎马倥偬，打了不少胜仗，可他却逐渐发觉一些过去声称为国为民的人只顾争名逐利，战火依然不息，天下依旧混乱，自己曾设想的新型中国还是遥遥无期，为此他时常陷入沉思和苦闷中。

1923年秋天，刘伯承率部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激战大足城，当迫近敌阵察看地形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右腿大动脉，伤势很重，他不得不离开川军，到成都治疗。

养伤期间，刘伯承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认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个胸怀大志的青年，15岁就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岁到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无产阶

级思想的影响，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回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刘伯承与杨闇公结识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长谈，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探讨救国的方略，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刘伯承逐步了解并赞同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开始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已走到尽头，若想救国救民，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他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当时，有一位激进青年曾劝说刘伯承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刘伯承认真坦率地回答：“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考，刘伯承在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开始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生涯。后来，朱德在回顾自己和刘伯承的经历时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有的人看到了新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50年代，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我是旧军人，也是四川军阀！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

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

刘伯承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先后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泸顺起义和南昌起义。泸顺起义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南昌起义则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1927年隆冬时节，刘伯承受党中央的委派，与吴玉章等人一起到莫斯科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以便进一步升到苏联军事院校中的最高学府——前苏联红军大学，即闻名于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一所为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而设立的学院，前苏联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深造过，当时许多国家也都派留学生到这里学习。

初到前苏联，语言障碍成了刘伯承学习中的最大困难。刘伯承当年已35岁，且装着玻璃眼球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他仅能用视力较差的左眼学习，横在他面前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刘伯承却信心十足。他逐渐摸索出了独特的学习俄文的方法，形象地把语法当作“钱串子”，下功夫掌握俄语的规律，同时又把单词比作零散的铜钱，日积月累，逐一聚集。他常常在大家早锻炼之前就去操场上朗读俄语，他说，这样第一不妨碍别人，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又在左手心中写满单词，直到完全记熟后再另换新词。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背诵单词，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他终于较好地掌握了俄文，掌握了进入新的军事学科大门的钥匙。

刘伯承的学习成绩在外国留学生中一直出类拔萃，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赞赏，被提前推荐进入伏芝龙军事学院深造。

在那里，刘伯承阅读了前苏联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直接阅读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原著，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同时，他还学习、研究了前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有关司令部建设、现代军队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术、游击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在莫斯科的图书馆里，他广泛涉猎了欧洲著名的军事家——拿破仑、老毛奇、小毛奇、克劳塞维茨、库图佐夫等人的论著，充分研习了欧洲的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军事翻译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伯承在异国他乡仍非常关心国内的革命和斗争情况。他经常通过书信向旧友了解情况，并向从中国来莫斯科的人询问祖国情况。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时，感到中国革命前景充满光明，大有希望。

1930年夏，刘伯承结束了在前苏联的学习生活，秘密回到上海。

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倡导者

1933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派兵50万，分左、中、右三路压向中央根据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围歼中央红军。

当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从反“围剿”中总结出来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攻击，被认为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他们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冒然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中央军委采纳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决定，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一再申明，但无济于事。红军奉命向敌人展开进攻，部队伤亡很大。紧急情况下，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决定改变战术，以小部队佯攻，主力待机歼敌，又派出一支部队伪装主力，诱使敌人追击。当敌人忙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分三路推进时，东西两路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突然出现，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伤亡惨重。红军运用山地战术，以机动灵活的方法，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接连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穷凶极恶。

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下，1933年9月，他调集1百万军队，2百架飞机，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奥匈帝国。他参加德军同沙皇俄国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当了俄国的俘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参加前苏联红军，因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比刘伯承晚两期）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李德在担任军事顾问后，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是一味照搬欧洲军事课本上对战争的处理方法，进行盲目指挥。当时身为临时中央总书记的博古，拱手将指挥大权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和刘伯承再三说明：现在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妄图以堡垒战和持久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红军应相应地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来对付敌人，硬碰硬是要吃亏的。博古和李德等人却认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军事路线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应该抛弃这些过时的东西，重新建立一套新原则。他们提出要分兵把守根据地大门，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最后，李德的意见被采纳。在“一切为了前线”、“绝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口号鼓舞下，很多干部、战士和群众为保卫红色政权同敌人英勇战斗而光荣牺牲，可是战局并没有因巨大的牺牲而得到扭转。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部队一天天地减员。为此，刘

伯承曾找到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如果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那根据地将会丢掉，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李德以嘲笑的口吻说：“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学院！”几天后，刘伯承接到博古的通知，他被撤销红军总谋长职务，下放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

刘伯承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而是更加关心游击战，总结游击战的经验教训。1934年他写了《现在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他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的几个教训》一文，指出游击队应到敌人后方广泛争取工农群众，创造游击区域，到艰险的环境中去开辟途径，推进革命事业。他还总结和归纳了许多机动灵活、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对中国革命军事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但是，整个战争形势已经无法挽回，根据地一块块被敌人占领了，红军由30万人减员到不足10万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红军被迫长征，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从乌江到遵义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在川黔建立根据地，并调刘伯承回军委，任总参谋长。这次会议对长征的战略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自黎平会议以后，刘伯承开始成为开路先锋。当时，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都相信，积极主张游击战的刘伯承一定能成为实现战略转变的有力执行者，一定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定能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

1934年底，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挺进到乌江南岸。乌江，自

古称为天险，它江岸陡峭，水宽流急，地势十分险要。贵州军阀侯之栓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派兵烧毁了南岸的村庄，掠去了江边的船只，赶走了百姓，在北岸修筑工事，凭险扼守，严密地封锁了江面，妄图阻止红军渡江。

刘伯承受毛泽东委派，亲自到乌江边指挥渡江。经实地侦察，刘伯承判断：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多，兵力强，不易攻取；而渡口上游几百米处的小道，虽然难于攀登，但敌人在那儿的防范较松，有夺取的可能。于是，他果断地决定：佯攻渡口，主攻小道，利用好时机，抓紧架桥过江。

在刘伯承的指挥和安排下，红军全部飞越了乌江天险。工兵连制成简易竹排，并奇迹般地在乌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

1935年1月7日，刘伯承率部智取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这一胜利，给整个红军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战士们对胜利的信心。智取遵义，显示了红军游击战的正确性和威力，彻底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另外，占据遵义，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创设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使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在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主力会师会宁城，从而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

设伏神头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

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期间，因为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刘伯承更加注重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在他担任师长的一二九师，一般干部、战士过去大都熟于阵地战，缺乏独立机动性，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不太了解，甚至有些怀疑。对此，刘伯承一边率部作战，一边挤时间编写演讲稿和军事论文，阐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具体运用。他曾对“游”与“击”以及两者的关系有过极具精辟的阐述：“游，即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即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击战巧妙配合起来。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刘伯承的有关演讲、报告和著作对部队指战员明确和灵活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大有裨益，对我军军事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初，刘伯承以其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打了一场相当干脆漂亮的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在此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很难左右机动。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认为山岭太崎岖，不便我军展开兵力。刘伯承则指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方面的利弊经常是成反比的，假如这次战斗换个开阔的地形，确实便于我军展开，但同时对方也如此，而且敌方显然比我方占更大的优势。刘伯承决定选择利于我方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方展开回旋的神头岭作为战场。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决定只以1个营兵力作吸援部队负责奇袭，而以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神头岭三面设伏。这种兵力部署和伏击区的选择，充分显示了刘伯承胆大心细、多谋善断的指挥风格。

整个战斗拂晓开始，当日下午4时结束。赶来增援的15000余敌兵，除百余人逃脱外，全部被歼于神头岭。这次伏击战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